

革命需要 红十字

揭秘中国工农红军卫勤保障

◆ 白孟宸



■ 红军用树皮制作的医疗器皿



▲ 艰苦奋斗创办起来的红军医院

1935年,长征的中央红军序列里,出现这样一群奇怪的战士,他们一边走,一边小声唱着很怪的歌:“阿司匹林托式散,先治咳嗽后治喘……”有时,他们会突然抓起挂在背包上的小木片,低头看一眼,然后将木片放回去,继续低声唱歌。宿营时,这群战士不会马上睡觉,要么在衣服或铺盖卷上缝着什么,要么用细线小心地打结,然后又拆开。他们是谁?他们在干什么呢?

帆布担架都算“高大上”

其实,这些战士是红军在长征中设立的流动医护训练班的学员,到长征结束,这个班培养了数百名军医、看护人员及卫生员,仅红三军团卫生员就有九成是从这个班里出来的。他们在长征及之后岁月里救治了成千上万的指战员和群众。

作为官兵一致、以兵为本的革命队伍,红军始终重视卫勤工作,可以说,卫勤体系是随着人民军队创立而一步步建立起来。解放后曾任

卫生部副部长的贺诚,1925年在北京大学医学部上学时就入党了,1927年参加广州起义,失败后,起义军余部撤至花县,编成红军第四师,他出任军医处长,头一回把自己的所学用于卫生勤务。

比起广州起义部队,秋收起义部队的条件更差,因为军事形势太严峻,重伤员只能托付在沿途的药房甚至老百姓家里,轻伤员勉强随队行动。1927年初,部队大体在

井冈山站稳脚跟,便立即组建后方医院,各团成立卫生队,以红十字旗为标示,专门医护人员也带上红十字袖章。1928年春,朱德和毛泽东的队伍会师,组成红四军,不仅有了更健全的党政工作体系,基层营连卫生工作也开展起来,对个人卫生、宿营地设施要求更细了。红军的战时救护要求是“不能丢掉一个伤病员,不准有伤病员得不到救护(的情况)”。老战士回忆,各部队都把红31团当模范,他们有装备帆布担架的正规担架排,而此时多数红军担架是用竹子和稻草临时制作的。

穿越封锁区

这一时期,中共中央从上海等地抽调医护人员赴各个苏区支援。前文提到的贺诚,此时就结束在上海的地下工作,“启程去江西当红军了”。由于穿越白区的交通线时断时续,贺诚抵达福建后便被暂时留下,到当地红军大洋坝医院当医生。过了好一阵子,他才在闽西军区一个团的护送下,进入江西苏区,当上中革军委总军医处长。此时,红军已在兴国莲塘设立总医院,院长正是戴济民。红军总医院已发展到7个分院,最多时收治过上万名伤病员,但条件依然艰苦,药品除部分来自缴获,大多是从白区偷运或当地自制的中药草,医疗器械干脆是土法制造,有些甚至是

木匠器材。更棘手的是偌大的总医院,专职医生却寥寥无几。

在贺诚等人的努力下,1931年冬,红军在莲塘开设卫生学校,这是我军第一所训练卫勤人员的机构。为节省时间,学校采取“重点教育”,以部队最普遍的伤情疾病为教学重点。这样,卫勤干部得以大幅增加,到1933年,中央红军前后方卫勤单位的人才缺口基本被补上。同时,红军也创办了最早的卫勤器材厂,大量生产医用棉花、纱布、绷带、一般外科手术器械等。考虑部队行军需要,器材厂大量配置各类中药。到长征开始前,红军各部已获得3个月供给量的药品,总卫生部还携带了200担医疗用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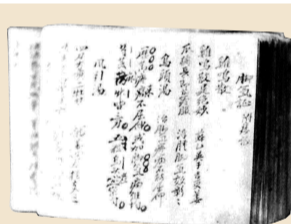
革命的人道主义

1929年,中共湘南特委奉命建立黄岗医院,号称能收容千名伤病员,其实这座设在破庙的医院在敌人封锁下得不到最基本的医疗用品,只能就地取材,像手术用的刀、剪、镊是靠铁匠打制,探针和镊子是用竹子切削成的,注射液则是用土蒸馏器自制。为搜集药品,医院成立草药科,请当地中医和药农进山采掘药材,然后再自行配置丸、散、膏、丹。有些专业器械实在无法自给,像唯一一副胶皮手套、少得可怜的注射针头、止血钳和三折器械包,医院都是专人看管,伤员也纷纷主动要求留给更急需的战友用。

除了物资奇缺,专业人员也很少,全院收容大量伤病员,可只有四名医生和七八名护理人员,因为缺乏固定病房,重伤员被安置在山洞中,轻伤员分散借住百姓家,医护人员每天都要端着盆子翻山越岭,挨家挨户地上门治疗和换药。除了治疗,他们还给伤病员做思想工作,空闲时间还得自己种瓜种菜,养猪积肥,改善伤病员伙食。看到医院上下不辞辛苦,伤病员们都能主动配合治疗,亲历者回忆,当时指战员极少有住院两个月以上的,大部分轻伤

员根本不肯下火线,担心增添医护人员的负担。

随着苏区扩大,红军卫勤体系也开始进化。1930年红军打下吉安后,将隐蔽在周边的伤病员集中到县城,毛泽东亲自动员当地名医戴济民参军,他说:“当医生的,向来说搞人道主义。但在旧社会是为个人利益,为少数人服务的,如果参加革命工作,为伤病员服务,那就不是为个人利益的人道主义,而是为革命的人道主义,是最光荣不过的。”戴济民很快组织全城中西医,前往青原山大庙的红军伤病员集中点,那里条件很差,也缺乏管理,伤病员已有三天没得到护理。戴济民与红军干部当机立断,马上成立“红色第一分院”,将伤病员按情况分为四个连:一连为重伤员,二连为轻伤,三连是下肢溃烂的伤员,四连是内科病人。按照分工,三、四连由吉安中医负责,而7名西医负责800多名轻重伤员的医疗护理。由于工作太忙,医护人员每天无法保证四个小时的基本休息。随着根据地扩大,红色第1分院在不到1年时间扩大到1个总院和4个分院的规模,每个分院能够容纳500名伤病员。



■ 红军用过的医书



■ 红军连环画《发扬阶级友爱 为巩固部队而斗争》中关于卫生勤务的内容



百炼成钢的人

1934年,由于第五次反“围剿”失利,各苏区红军陆续进行长征。由于战斗激烈,大批卫勤人员牺牲在路上,像中央红军出发前,已有7000多名受过培训的卫勤人员,还有200多名在校学员,可经过几次恶战,红军进入贵州时,基层卫勤力量已捉襟见肘,卫校教导队不得不解散,教员直接充实到各医院和卫生所,学员则回部队工作。遵义会议后,军事形势有所好转,卫校也一度恢复教学。1935年6月,红军分兵,卫校一部分由教务主任王斌带领跟随右路军北上,另一部分跟随总卫生部编入左路军,10月中旬,在总卫生部要求下,卫校复课,除了培训原中央红军军医班学员外,还招收了红四方面军的卫生干部和女红军,这批学员的素质较高,后来都成为军事卫勤工作的骨干。

除卫校以外,各军团在长征期间不断开设医护训练班,像前文提



■ 陕北红军医院女护士

到的红三军团就开设了军医班和护训班,在恶劣的条件下坚持边行军,边作战,边教学。红四方面军总医院也在护士学校基础上开办医务学校,各军医院则单独开设了卫生员看护训练班。

整个土地革命岁月,红军卫勤体系从无到有,经受住残酷的血火考验。当这些百炼成钢的“红十字战士”抵达陕北根据地时,一个新的中国革命形势已展现在他们面前,一个更伟大的征途就在前方。

消灭“时疫”的奇迹

建立最初的野战医疗体系的同时,红军还在党的领导下协助苏区预防疾病。1932年,《红色中华》杂志上发表《大家一起来做防疫的卫生运动》一文,指出“卫生防疫运动的开展是保障工农群众和红军的健康运动,是为巩固革命力量去争取苏维埃更大的发展和胜利的运动”。由于条件简陋,根据地防疫体系首要任务是改变农村旧有卫生习惯,加

强农民卫生防病意识。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江西成立后,颁布的《苏维埃暂行防疫条例》确立6种防疫办法,包括房屋定时大扫除,垃圾清理,晾晒家具和被褥等,并提出10-15个家庭为单位组成卫生运动组。

苏区也建立最初的疫情报告和登记制度,要求每月统计各地出现的病症以及因病死亡的人数。在此基础上,苏区建立消杀隔离制度,从

病人隔离和病毒消杀两个方面规定传染病的应急处置办法,对发病严重的地方,要求方圆五六里内进行交通隔绝,禁止开大会等导致人员聚集的活动。由于苏区防疫组织严密,至1932年,苏区很多区县消灭“时疫”,例如闽浙赣苏区疾病减少90%。《红色中华》1934年3月报道曾发生鼠疫的西江县,“全县严重的时疫完全被消灭了”。



■ 红军实施长途奔袭



红色征程